

“編輯學者化”與中國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

原祖傑

朱劍在《澳門理工學報》2018 年第 2 期上發表的《編輯學者化：何以討論了三十年》，道出了他從業以來所觀察到的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之主要癥結所在，引發了廣大期刊編輯的共鳴。在差不多同時發表在《清華大學學報》上的《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一文中，朱劍也花了大量篇幅討論“編輯學者化”問題。若對此再加贅述，很容易畫蛇添足，但是，朱劍的文章總能激起同行的思考、遐想、焦慮與不安，也推動著人們去反省、拷問、質疑與探索。

一、期刊編輯身份的名與實

如朱文所示，編輯學者化，首先意味著編輯本來不是學者，或者不完全是學者，而需要通過努力來轉化身份。當然，也可以做另一種解釋，就是編輯本來就是學者，卻經常不被看作學者，這樣的話，編輯學者化就是要為編輯正名。編輯要有所作為，對其身份就要有個明確的說法，而這個說法幾十年來隨著時代的遷移和政策的更替屢加改變，不免讓眾多當事人惶惶然。

根據朱劍的研究，編輯之游離於學術共同體之外始於 1950 年代編輯的職業化。儘管當時各大出版社和期刊雜誌社均聚集著一批學富五車的大學者，但職業化後形成的勞動分工給人們造成一種鮮明的印象，那就是出版發行機構是為作者服務的，其主要職責在於傳播而非創造。一方面盡量為學術發表開拓更為廣泛的發行渠道，另一方面為了更好地傳播學術思想和學術發現，對作者的成果加以改造、加工甚至包裝，即所謂“為他人作嫁衣裳”。

當然，職業化後也有不少在高校或科研機構工作的編輯繼續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有很多編輯著述並不少於從事科研教學的“學者”，1980 年以後實施了《編輯幹部業務職稱暫行規定》，編輯職稱自此有了規範的名稱：“編輯幹部的業務職稱定為：編審、副編審、編輯、助理編輯”，對應於科研崗的研究員、副研究員和助理研究員以及教學崗的教授、副教授和講師，待遇方面至少在上個世紀相差並不大。相較於窮經皓首的研究者和兩袖粉筆灰的教書匠，編輯應該是人們羨慕的職業。筆者在 1980 年代就聽到一種坊間說法：“小學者求小編輯，小編輯求大學者，大學者求大編輯”，雖然未必準確，倒也將編輯、學者之間的關係刻畫得惟妙惟肖，至今印象深刻。按理說，那個年代的大部分編輯應該是不存在身份焦慮的。但焦慮又確實存在，尤其是在學報這樣的綜合性期刊當中，主要原因可能還不在於專業化分工，而在於單位化隔斷了學報編輯與學術共同體之間的緊密聯繫，也讓他們的思想被禁錮在各自的學校，被迫專心經營學報這塊孤立於學術共同體之外的自留地，而對於校園之外的學術世界，就會有越來越強的疏離感。

這樣看，所謂身份焦慮，應該主要存在於一批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編輯當中。中國傳統的理想主義者往往重名輕實，體現在作為現代知識分子一部分的編輯們身上，他們所追求的，是推動

中國學術的發展，而不是滿足於個人的權力慾和存在感。而他們的焦慮多半也是來自對學術和學術共同體的關懷。他們中的改革派往往充滿自我反省意識，對期刊界的種種亂象深惡痛絕，對以學報為典型的綜合刊學術質量下降憂心如焚，對期刊界的權力尋租無情撻伐，對源於體制的行政干預無畏抵制。而帶有現實主義傾向的期刊編輯首先會接受現實中的各種安排，包括對編輯身份的定位和不可抗的各種政策轉變。然後他們會從實際出發，將個人命運與體制安排結合起來，在體制範圍內或者推動期刊的作用或者追求個人的利益。

應該說，無論是理想主義者還是現實主義者，對期刊編輯掌握的學術權力都是心中有數的。理想主義者不願意面對這種權力主要還是出於道德層面的顧慮，出於一種敬畏學術的誠惶誠恐。相比之下，現實主義者面對自己掌握的學術權力則更為坦然，並試圖積極主動地利用學術指揮棒發揮引領作用。根據朱劍的觀察，期刊編輯的這種權力意識的覺醒體現在對“編輯主體意識”的強調。所謂“編輯主體意識”，可歸納為兩種權力指向：其一是審稿權；其二是對學術媒介和學術傳播的控制權。（參見朱劍：《如影隨形：四十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理想主義者不願意承認自己手中掌握著決定學者命運的權力，因為他們覺得那樣是本末倒置，是對學術共同體的僭越甚至背叛。

二、期刊編輯身份的今與昔

懷有理想主義情懷的期刊編輯總是不滿於期刊發展現狀和編輯當下定位，試圖尋找期刊編輯在學術共同體中的應有位置，追求期刊編輯應該發揮的角色。那麼期刊編輯最初的定位和角色是什麼呢？如筆者在另一篇小文中所提及的，在1665年學術期刊出現之前，科學家們主要靠書信往來交流科學探索的心得，分享自己的發現。少數興趣廣博的學者的通信對象可能成百上千，這些人不僅是當今期刊編輯的前輩，也是現代情報學之父。由於掌握了很多人提供的科學信息，他們就具備了科學探索的全域意識，往往成為科學探索的贊助者（patron）和組織者。如法國著名天文學家佩雷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 1580～1637），就是一位成功的科學探索組織者，曾與他那個時代的很多科學家合作過，給他們提供各種支持。從1620年開始他與同代很多偉大的科學家、思想家們建立起通信聯繫。在他1637年去世後，他的侄女發現了寄給佩雷斯克的書信超過一萬封，來自荷蘭、比利時、英國、意大利和德國的大約500位思想家、藝術家和科學家。另一位情報學奠基人比利亞奧迪斯（Ismaël Bullialdus, 1605～1694），是17世紀法國著名天文學家、數學家，並通歷史、神學、古典學、哲學等，為當時歐美思想共同體（Republic of Letters）的活躍分子，還最早站出來捍衛哥白尼、伽利略和開普勒等人的科學思想。

從情報學中衍生出期刊學，部分應歸功於《哲學彙刊》的創辦者奧爾登堡（Henry Oldenburg, 1619～1677）。奧爾登堡是一位德國神學家，以外交家、自然哲學家的名聲聞名於當時，以《哲學彙刊》主編和科學同行評審制度的創立者流芳後世。出生於德國的奧爾登堡通過各種聯繫紐帶成功地加入到英國頂級科學家圈子中，並繼承了另一位德裔英國博學家哈特雷波（Samuel Hartlib, 1600～1662）在歐洲科學界的廣泛人脈，成為當時世界最前沿的科學探索的組織者之一。這一現象也從側面反映出，現代科學從其誕生開始就是無國界的。

顯然，作為科學活動的組織者或科學雜誌的主編，奧爾登堡這些人在科學發現方面的成績無法與他們的團隊成員或文章作者，如牛頓、達爾文、富蘭克林等人並駕齊驅，但其對科學發展的貢獻是不容低估的。筆者在《學術期刊何以引領學術》一文中，強調了學術期刊對學術共同體的

服務角色，提出應對期刊引領學術口號下期刊編輯的傲慢保持警惕。但是，如果我們追蹤一下學術期刊產生的背景和其早期歷史就不難發現，無論是期刊引領學術還是編輯引領學術都是有案可據的。學術期刊的編輯未必是一個領域的頂尖科學家，雖然這種情況在歷史上也不乏先例，但他們應該是學術共同體的當然成員，甚至在某些學術活動中充當著組織者和領導者的角色。

本來可以發揮學術引領者角色的期刊編輯何以還要為學者身份而焦慮不安、汲汲以求？除了當今世界專業分工更為精細之外，也與中國從 1950 年代以來不斷變化的人事管理制度有關。朱劍在其上述兩篇論文中對中國期刊管理和人事制度的演變過程做了清晰的梳理，在此僅就當下學術期刊編輯的處境和出路略抒管見。

從 1950 年代《文史哲》等學術期刊創立開始，很多重要期刊的主編都是由著名學者擔任的，編研一體在共和國早期應該不是問題，重點是從就業開始就投身編輯隊伍的學術編輯是否具備學者的素質，能不能被看作學者。朱劍曾引用全國高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前任理事長楊煥章先生的觀點：一個稱職的學術編輯，不僅要掌握編輯技術，還應該具備與學者同等的學術水平，惟其如此，才能達到學者化的目標。（參見朱劍：《編輯學者化：何以討論了三十年》）

1980 年代以來改革開放加速了學術期刊的發展，編輯隊伍的擴大也推動了編輯職業化進程。進入 21 世紀以後，隨著學術出版網絡化、數據化發展，期刊編輯所面臨的技術性挑戰越來越大，投入傳播方面的精力也越來越多。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要求期刊編輯具備某一專業領域的較高水平未免強人所難。但即使如此，我們也經常看到不少學術編輯在重要期刊上發表出高質量的學術文章，為何還要質疑其學者身份？甚至某些期刊編輯本身已經具備了高級職稱，並在相關領域有重要發表和學術造詣，在所屬高校的院、系也經常兼職上課，培養博士生或碩士生，卻仍然不能被認可為“學者”，原因何在？以筆者的觀察，主要存在三方面障礙：其一是職業分工更為細化。與前文提及的 17 世紀學術期刊編輯相比，當代期刊編輯的職業化特點更為明確，其主要職責在於學術傳播。即便某些期刊編輯在學術上有所建樹，有的甚至也可以像佩雷斯克、奧爾登堡等人那樣成為某些學術活動的組織者，但他們往往還是依託自己服務的期刊，其編輯身份不言自明。其二是人們的思維定式使然。出身編輯的學者除非辭去編輯職務，進入研究或教學系列，他們在其他學者心目中的編輯烙印很難抹掉。其三是制度性障礙，就是學報編輯不僅被劃到各個高校單位，還被當下的高校人事制度歸於教輔系列，顧名思義，為教學、科研做輔助工作，待遇上也低於教學、科研崗位。除了少數高校和科研單位從某些學科領域任命的主編或常務副主編按照教授或研究員崗位發放津貼外，編輯出身的編審或副編審很少被列入“雙肩挑”崗位，即使承擔了教學、科研任務也只能按教輔崗取酬。職業分工和制度性安排通常被認為是管理現代化、科學化的必然趨勢，這一趨勢在學術氛圍相對淡薄、行政權力更為強勢的當今中國則變本加厲。

三、期刊編輯身份的中與外

有關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的某些制度性安排或許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但學術編輯身份的歷史性演化則應該是現代社會的共同經驗。當中國學術編輯對自己的身份產生焦慮的時候，國外的編輯同行卻少見這種困擾，主要原因可能在於歐美發達國家的學術編輯在過去數百年中身份變化並不顯著，他們的選擇也是自由開放的。大體說來，現在的學術期刊主編做的事情跟 17 世紀的主編們差不多，就是在服務於學術共同體、推動學術發展的主要宗旨之下完成學術發表、增進學術交流和組織學術活動。學術期刊種類繁多，所服務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和範圍也大小不等，學術編

輯的構成和工作方式也會有所不同。統而觀之，服務於學術期刊的編輯們有以下幾個類別：

首先是期刊主編，幾乎無一例外地產生自相關領域的學者隊伍。他們往往是由其所在學術領域的學會組織推舉和任命的，對學會負責。現任美國《亞洲研究雜誌》（*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主編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曾提到另一份著名期刊，即《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前任主編邁克爾·格羅斯伯格（Michael Grossberg）給他的忠告：主編的“主要責任不是針對投稿的作者，而是服務於期刊的讀者群體”。（參見周薇薇、華志堅：《美國學術期刊的不同運行模式》，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相較於為數不多的作者隊伍，一份學術期刊的預期讀者可能是其所在的整個學術共同體。主編關心的首先不是滿足作者的願望，而是廣大讀者的信息需求，其服務於學術共同體的使命感昭然若揭。華志堅的說法也從該雜誌的執行主編詹妮弗·芒格那裡得到印證。芒格首先關注的也是將讀者放在第一位，要“為讀者勾勒出一幅亞洲研究領域學者當前研究趨勢的俯瞰圖”。（Jennifer Munger：《學術出版與〈亞洲研究雜誌〉》，王娟娟譯，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5年第4期）相比之下，中國的學術期刊主編們大多沒有這樣的使命感，即使學者出身的期刊主編，恐怕考慮更多的也是期刊的質量、聲譽以及與之相關的評價體系，期刊主編們共同體意識淡薄於此可見一斑。當然，華志堅教授對期刊主編責任的看法不能代表所有人。他所主編的《亞洲研究雜誌》是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的機關刊物，服務於學術共同體的意識自然要強一些。相比之下，一些私人創立的學術期刊則會呈現不同的情形。華裔中國史專家黃宗智（Philip C. C. Huang）1975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創立了《近代中國》（*Modern China*），四十多年來他一直是這個期刊的主編。與華志堅不同，黃宗智的辦刊宗旨更接近於中國大陸的主編們，即通過追蹤學術前沿來凸顯《近代中國》作為學術園地的地位和聲譽。

其次是期刊副主編、書評編輯們，他們大多由主編邀請加入，來自各個大學或科研機構，幾乎也都是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屬於教員（faculty）行列。副主編要協助主編處理約稿、審稿等方面的工作；而書評編輯則要為出版社不斷寄來的各種新著尋找書評作者。他們所承擔的工作因人而異，視工作約定和個人責任意識強弱而有所不同。

第三是期刊的執行主編。他們往往由主編邀請加入，協助主編處理辦刊工作。不同於華志堅及其前任們典型的學者身份，芒格雖然也是人類學博士，從事的卻是職業編輯的工作。與來自某所大學的主編們不同，芒格博士實際上是在為亞洲研究學會工作。此外，美國的一些重要期刊編輯部一般會聘用一到兩名編輯助理，大多由在讀研究生充任，協助主編或執行主編處理編務。

編輯部之外，國外期刊界周圍還活躍著一支屬於自由職業的文字編輯（copy editor），他們往往會長期服務於某個或某幾個期刊，根據工作量多少按勞取酬，相當於中國很多學術期刊編輯部的文案編輯，負責文章的潤色、格式的清理事項等方面的工作。他們中也不乏某個領域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但離標準的學者身份似乎相距更遠了。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期刊編輯身份的中與外，似乎會明白一個道理，少些行政干預，多點順其自然，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解決編輯身份焦慮的根本途徑。根據期刊工作的需要和其重要性設置相應崗位，至於在這些崗位上工作的是編輯還是學者，或者二者都是，可以由其工作性質決定，當然他們的待遇也應該根據勞動強度和市場稀缺程度來決定，而不必囿於所謂教輔崗位。要實現這一目標，就應該打破束縛期刊編輯身心自由的高校單位，讓他們回歸學術共同體。

（作者係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四川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

[責任編輯 劉澤生]